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苗族发展史

梁聚五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苗族发展史 / 梁聚五著.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9. 5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ISBN 978-7-81126-140-0
I. 苗… II. 梁… III. 苗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1.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8284号

苗族发展史

梁聚五 著

策 划: 张三白

责任编辑: 立 道

出 版:  贵州大学出版社
发 行:  昆明文汇书局
设计制作:  贵阳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5
字 数: 228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26-140-0
定 价: 38. 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本书获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瓊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2013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年。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于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

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用六年的时间，以每年一个专辑十本的速度，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 60 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08 年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其主题是苗学。因为苗族是贵州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也是有史可稽的与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多民族中的一员。为完整地体现贵州苗学的不同阶段最重要成果，我们有选择地重印了部分名著，翻译了国外研究苗族的部分重要著作，也采用了我国学者的部分优秀苗学研究的新作。

出版前言

苗族，就其人口数量言，是中国第五大民族，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苗族有 894 万人。苗族同时又是一个分布世界的民族：在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有 200 多万人，美国有 30 万人，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共有 5 万人。苗族还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距今五六千年前，苗族先祖蚩尤就同华夏族领袖黄帝、炎帝逐鹿中原并称为中华文明三祖。千百年来，苗族因战乱所迫，迁徙无恒，最终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才找到生存之地。现今贵州的苗族有 400 多万人，约占全国苗族人口的一半。贵州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族也是贵州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

研究苗族和苗族文化的学问叫“苗学”，古代贵州的“苗学”文字，大多来源于地方官员，如李宗昉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田雯的《黔书》、胡宗绪的《苗疆记事》、龚柴的《苗民考》、贝青乔的《苗俗记》、徐家千的《苗疆闻见录》等。最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有清代组织的《百苗图》编绘。但上述著述大多立场偏颇，观念“正统”，又只是为“王政”或“战事”服务，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的“学（-ology）”。

运用现代学科方法而发轫的“贵州苗学”著作，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早期人类学家，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萨维那所著的

《苗族史》，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等人大量的调查报告，还有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19世纪最后十几年至20世纪最初的20年，可以将它们看作是“贵州苗学”形成的初期阶段。换句话说，“贵州苗学”研究始于西风东渐。这使得“贵州苗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的视野。之后出现的《贵州苗族考》（1929，杨万选著）可以看作是贵州苗学研究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抗日战争，大批大学教授和学者内迁贵州，从而促成贵州苗学研究的高潮。这一期间，贵州苗学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水平学者带领下的有组织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活动；二是苗族群体中出现的学者提供了“自述”的视角与研究。当年，闻一多等名教授带领的西南联大学生在贵州境内的采风；大夏大学成立了由名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徽等领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编辑了有关贵州少数民族方面的专门刊物：《大夏大学民族学论文集》、《苗夷研究丛刊》，出版发行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新谣》、《贵州苗族概论》等著作。这一时期，苗族学者已初露锋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梁聚五氏，其著有《苗夷民族发展史》；若杨汉先氏，则著有《大花苗迁入乌撒考》等；王建明氏，撰有《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等文；王建光氏，撰有《苗民的文字》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至60年代，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教育院校。我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也为配合民族自治、民族识别等工作，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为贵州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编印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苗族简史简志》；各民族自治的地方也编写了相关概况。大量调查中的“采风”作品也都收入《民间文学资料》得以编印流通。这一阶段，贵州苗学研究最大特色是“政府行为”——由政府组织得以实施。

“文革”期间，贵州苗学研究和其他任何社会科学一样，沦为空

白。虽然，此期仍不乏罕见成果，如台江农民王安江为搜集苗族古歌的艰苦努力——他从1968年开始，行乞为命，周游各地，徒步跋涉数万里，收集整理了完整的《苗族古歌》，至今仍然是值得为之赞叹的壮举。

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文革”造成的十年空白之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重建取得了丰硕成果，贵州苗学研究也成果斐然。这期间，主要的苗学研究著作有：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杨庭硕的《百苗图研究》，翁家烈的《苗族文化论》，麻勇斌的《神性妇女研究》，杨培德的《鼓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罗庭华、余岛的《贵州苗族文化教育研究》，徐新建的《苗疆考察记》，石朝江的《中国苗学》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自苗族内外，也来自海内外。相关的涉及苗族的研究，在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的各种视角下，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后，除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势头，苗学研究进入到“整合”阶段，有了大部头的《苗族通史》的面世，《20世纪苗学研究百部文库》首次出版第一辑便有10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也由英、苗、汉学者共同完成；首部集可视、可听、可读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也由本社出版。贵州苗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本丛书第一辑将目光集中在过去百余年来贵州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努力保留各个时期的阶段性代表作品。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重要著作之一，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一直未能译成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找出原书并组织了翻译；曾被称为“苗族救星”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写过《苗族纪实》，另一英国传教士克拉克著有《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此二书现合并刊行；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在1936年曾经刊行，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代表作品此次亦作再版。

19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是苗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

此期间我国重要民族学者的著作中，我们选了杨万选著的《贵州苗族考》（1929）与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人的文章合为一册；苗族学者梁聚五著的《苗夷民族发展史》则更名为《苗族发展史》独立成册。

50年代至60年代，因贵州民族出版社曾出有大量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我们仅选载了著名学者费孝通“劳动的苗家”与中央民族调查团的一份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合为一册，用以反映当时的调查观点和调查方法。

80至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苗学研究恢复发展的时期。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和石朝江的《中国苗学》，也是此时期成果丰硕的苗学研究的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苗学研究日趋繁荣。考虑到苗学研究的这一现状，我们选择了美国学者路易莎和台湾学者简美玲的新著，以期读者能够了解海外贵州苗学研究的趋势和前列学者的成果。

区区十册，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贵州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原宥。作为贵州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和成果最多的部分，“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刊行的是“苗学研究”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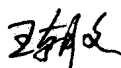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贵州苗学研究各个时期的特征和认识水平，除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谓作了删改外，尽可能保留原著原貌。另外，有些文章的著作权人一时未能联系上，为其大作早日出版，泽惠学林，不得已只好先行采用。我们恳请原作者或著作权继承者海涵原谅，并请与本社联系。

出版者

序

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大本营，贵州也应该是苗族研究的大本营。18 世纪下半叶以来，贵州苗学从“潜流”（未有苗学研究之名但已有苗学研究的著作）变为“洪流”（20 世纪 80 年代为“苗学”立名并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也与“藏学”一样正在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显学”。不管怎么说，贵州苗学从来就是贵州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

贵州有许多优秀的苗族学者和苗学研究著作，也有许多优秀的国际学者研究贵州苗学。这是贵州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贵州文化建设的一笔重要财富。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苗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贵州苗学重要著作的集成放在其向贵州建省 600 周年献礼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出版，感到可喜可贺。出版社同志嘱我作序，千言万语无从下笔，写下几句感言，是为序。



（原贵州省省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苗族）

按:本册收录贵州早期苗族学者梁聚五先生的《苗族发展史》(原名《苗夷民族发展史》)。

梁聚五先生出身于黔东南雷山县西江大寨。早年肄业于湖南大学,后赴广州参加革命,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营政治指导员及二十军军部少校参谋。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一·二八”的上海抗战和1934年华北张家口等处人民的抗日斗争。之后,曾参加“倒蒋运动”。1936年回到贵州任省参议员。1940年,随军出国到缅甸抗日,1943年,重任贵州省参议员。解放战争时期,梁聚五先生参加了民主同盟,成为民盟在贵州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任《贵州民意》社社长。解放后,梁聚五先生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77年在成都逝世,享年86岁。

梁聚五先生除了军事、政治活动外,还是一位有相当成果的苗学开拓者,他对本民族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有炽烈的感情,对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极为不满。其有《苗族发展史》、《苗族人民在反清斗争中跃进》、《论贵州政治应以苗夷问题为中心》、《西南边地概况》和《贵州苗夷选举问题》等论著传世。《苗族发展史》写作于40年代,1950年印行,80年代,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曾作为内部资料再次编印。本次刊行是该书首次公开出版。《苗族发展史》被视为苗族学者研究苗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有“第一个苗族学者写的第一本苗族史”的评价。书中“苗夷民族”泛指包括苗族在内的南方民族,反映当时民族学的认识水平,故仍保留。

原版序言

苗夷民族，是有历史的民族。他们的历史，也和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是跟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前进的。

可是许多历史学人，尤其是为着中国历代统治王朝写家谱的历史学人，往往忽略了苗夷民族，不肯把他们的历史写上。即令写了一些，大抵是歪曲的、片面的，甚且无端加以歧视和侮辱。

到了蒋介石窃据中国政权以后，他和他率领的反动之一群，对于苗夷民族的镇压和迫害，较历代统治王朝更残酷。

今天可不同了。中国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领导下，已摧毁了历代统治王朝和百年来帝国主义所加给我们的一切铁枷锁链，而解放了中国整个大陆（西藏台湾待解放），解放了中国被压迫阶级和各个被压迫民族。

各个被压迫民族，包括苗夷民族在内，可以起来写自己的历史了，而且要大胆的写着。只要我们站在真理的前面，谁也不好说这是不应该的事。

我不揣浅陋，鼓着自己勇气，翻翻中国历史，在许多歪曲的，片面的，含有歧视和侮辱性的苗夷民族历史当中，找出一些接近真理的史料，把它记录下来，结合实际，加以整理，写成这本小册子——《苗夷民族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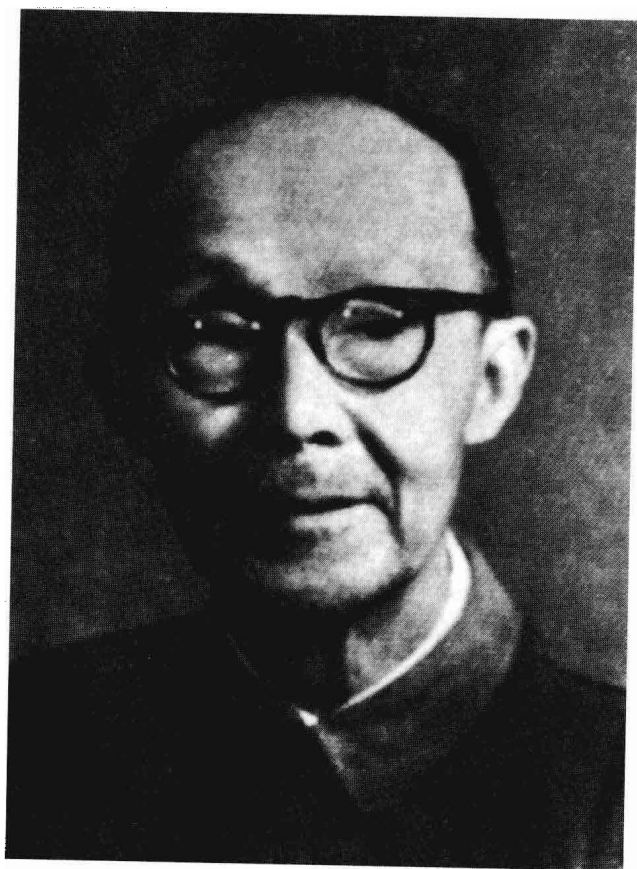
这本小册子，只是草稿，不是正本。其所以把它付印，为要

拓出多份，以便分送各地友人，请他们批评指导，使它成为比较正确的历史资料，作将来正式出版的预备。如国内外贤达专家，不以这本小册子为浅陋，更希望不客气的加以批评和指导，那就感激不尽了。

再，这本小册子，得林壬、姚颖达、柳寿春、王亦飞、周剑江、林经隆等同志，在物资上、精神上给予帮助，始得印出，特此志谢！

梁聚五

1950年8月30于贵阳



梁聚五 先生